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之八

新加坡 华人社会史论

梁元生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
Global Publishing Co. Pte. Ltd.



创作室

联合出版

新加坡
华人社会史论

梁元生 著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联合出版
八方文化创作室

自序

离开新加坡十多年了，我一直对这个人称“狮子城”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也许可以说是对“第二故乡”的怀念和依恋吧！一方面因为这是我念完博士之后第一份工作之所在，是我的教研事业的起步点；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在这里成长和入学，在这里度过他们愉快的童年。我们一家人在新加坡生活了八年，本来以为会以此为家，在此终老。然而世事不能尽如人料，天命也无法预测！往后多年我到美国继续教学和研究，兜兜转转又回到出生及长大的地方——香港，回到自己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究竟是鸟倦知还，抑或是志在故土？连我自己也难以说得清楚明白。

在新加坡的那段日子，我对本地华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由於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本身性格使然。从小以来，我对周边的事物和环境都有特别的兴趣。每到一处新地方或新环境，我都希望尽快和尽量投入及融入，才能觉得生活有趣味和有意义。因此之故，我在1980年来到新加坡之后不久，便即投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研究。我的兴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华人历史研究，二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第二个范围内，我参与的工作包括在1982年以后加入由新加坡政府推动的儒学计划、帮助编订儒家伦理教育中学课本和教材以及负责培训教师等。至於历史研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十九世纪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虽然最初几年我在新加坡并没有汽车代步，但为了考察早期华人社区和生活的历史，我走访了不少古迹名胜。当然，这期间也得到了多位好朋友的引领和帮助，像王慷鼎、辜美高、林孝胜和杨松年等。然而，我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档案和文献研究上，特别是阅读早期新加坡出版的各种华文报刊。我平均每天都会花上三四个小时躲在国立大学图书馆

的地库内，埋首阅读报纸的缩微胶卷，不知黄昏入暮，也不知近视度数加深。我用了数年时间把《叻报》、《天南新报》、《星报》等全部看完，而且作了详细的笔记和卡片。至於稍为晚出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我也看了不少，而且买下几十年的《南洋商报》合订本，装满了整个房间。由於灰尘满布，加上蠹虫甚多，叫家里的人怨声载道，但我却总是乐此不疲。

几年下来，我在报纸和文献中发掘到不少新资料及新题材，对新加坡早期华人史的研究兴趣也越来越大。最初我尝试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引起相当多关心本地历史同行的注意，至今还有不少本地史家把我引为同道，甚至以为我是本地人。本书部分文章即源於此时期的阅读和写作，以后经过一些修改而成。及至1988年之后，离新去美，不得不放下新加坡华人历史这个研究课题，改作新的题目，例如美国华侨及中国留美学生历史的研究，但一直对新华社会总未忘情。到了1992年回到香港之后，便重拾旧欢，再次钻研新华历史，幸而以前累积下来的卡片都还随身带着，不用重头开始。这些年下来成果累累，现在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创作室的鼓励，集稿成书，作为“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之一出版，期间李焯然教授之帮助极大，谨致万二分的谢意；八方文化创作室在编辑和出版上的帮忙及辛劳，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梁元生

2004年11月10日

於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目 录

自序	iii
第一章 导言：早期新加坡之“士人社会”	1
第二章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士”阶层之分析	9
一、引言	9
二、会贤社课榜名录	9
三、名录背后的几个关键人物	15
四、会贤社名录的分析及其启示	21
五、会贤社课榜与其他名录之比较观察	26
第三章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	31
一、引言	31
二、诗人南游	31
三、与左秉隆的诗歌对答	33
四、新洲酬唱的其他诗友	40
五、百年前的诗社文会	45
第四章 凝观与反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星沪之间两本游记的解读	51
一、引言	51
二、1887年李钟珏访问新加坡	52
三、李钟珏眼中的新加坡	53
四、1888年李清辉访问上海	56
五、李清辉眼中的上海	57
六、镜子里的投射：从凝视客体中寻找自我形象	59

第五章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	63
	一、从现在的儒学运动说起	63
	二、十九世纪末儒学运动的背景	65
	三、课程与读本的改编	65
	四、教研机构的设立	69
	五、海外学人的访问	72
	六、中英双语的并用	76
	七、结语	78
第六章	宗教与革命：早期新加坡华人基督徒对中国 革命运动的回应	79
	一、引言	79
	二、三重身分的人	80
	三、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华人基督徒	82
	四、热烈支持者：黄乃裳与郑聘廷	85
	五、冷眼旁观者：宋鸿祥及其他“华人基督徒协会”会员	92
	六、态度暧昧者：孔天曾与林文庆	96
	七、结语	98
第七章	潮兴、潮落：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两个潮人家族 之历史考察	101
	一、引言	101
	二、早期新加坡的潮人社会	101
	三、潮帮“皇帝”：余有进、余连城家族	104
	四、革命侨领：林义顺、林忠邦家族	109
	五、两大家族之更迭与潮帮权力之转移	112

第八章	二十世纪早期新加坡琼人社会及其政治取向	117
一、引言		117
二、二十世纪初新加坡的琼人社会		118
三、从革命者到民族主义者		122
四、琼人与社会主义		127
五、结语		131
第九章	文化回归与华魂再续：现代新加坡的儒学运动	133
一、引言		133
二、文化工程		133
三、文化压抑		136
四、华魂再续		138
五、重归于寂		141
第十章	新加坡儒学：源起、发展、特征与评价	145
一、新加坡的儒学教育计划		145
二、儒家思想的代言人：李光耀		147
三、李光耀的儒学：内外悖反的践行论		150
“外圣”：儒家伦理与外交应用		152
“内王”：社会工程与权威政治		154
四、结语		156
附录	会吟社联榜	159

第一章

导言： 早期新加坡之“士人社会”

(一)

长久以来，许多治新马华人史或海外华人史的学者，皆以为早期海外华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双层阶级的社会（two-tier society），和传统中国的“四民”社会有别。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农、工、商各占一席重要的位置，而士及由士延伸出来的士大夫及士绅阶级，在社会上为统治阶层，最为重要。与传统中国社会比较，海外华人社会最显著的分别是在于士绅阶层的不存在；或者，在一些海外华人社区中容或有少数士人的存在，但他们却在社会上毫不重要。这个看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我们检视早期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以及审查各地华人社区形成时期的社会结构，我们便不得不同意：早期海外华人社会的确是以工、商为主体的。早期移民之中，文人士子甚少。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士人皆以入仕为官为理想，而其身分与权力又与科举制度有极其密切的关联，所以绝不轻易放弃科举进仕之念。一旦远走异国，不但没有科举功名，进仕为官以及连带的社会利益与权力都没有了，再加上士人深受儒家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就更不欲移民外国了。一般看来，只有孳孳为利的商贾和家贫无计之白丁，才会离乡背井，求发展于外洋。以识字之辈来说，除部分商贾外，便是暗图反清的政治异议分子，但人数不多。

以新华社会历史而言，初期的华族移民，亦多是工人与商贾，士人的成分极少。而商贾操经济之权，有雇工及裁汰之力，故在华族社会中俨然成为统治阶级。虽然乡族宗社及私会党在早期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势力，但这些力量还得

依附经济势力，所以富豪巨贾与上述两种力量往往结集起来，形成共同控制劳工阶级的力量。

一般认为，近代新华社会的知识阶层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才逐渐出现的。这些以知识或文字持生的文人及知识分子，包括学校教师、报馆编辑、作家、艺术家以及其他的文化人。他们的出现和集结成一个社会阶层，是双层形态的工商分化和新教育逐渐普及之后的结果。社会多元化以及各种行业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后期便开始了，但新教育的普及化则是1905年以后的事。二十世纪初，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如养正、应新、启发、端蒙、道南及育英等新式学堂，均于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先后开办。学校的蓬勃发展和文化事业的陆续兴办，促使知识行业的扩大及更多的中国士人南来，加上学生人数增加，和一般人识字率的提高，社会上便有一批以知识谋生或所谓“劳心”的人，形成一个“知识阶层”(intellectual stratum)。因此，多数学者皆以二十世纪初新教育的发轫时期为新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递变中之转形期。

(二)

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于说明士人阶级在新华社会中的出现及凝聚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时间可能远在新教育发展之前。大概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以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多元化过程已经开始，不再纯粹是由商贾与劳工所组成的两级社会。在新华社会中，已有一批为数甚众的士人，其生活特征、思想和性格均与传统中国的文人和书生相似，有专以教学及文字为业的，也有分散于不同行业之中，如医、艺、出版、印刷及其他文化行业等。他们虽然没有像中国士人那样专以科举功名为进路，但科举功名还是不少本地士人的梦想与愿望。他们也和传统中国士人一样喜欢集会结社，互为呼应，在社会上建立清誉，受到社会上其他阶层（包括商人阶级）的尊敬。

这一种传统类型的“士”可以本书第二章及第三章所叙述与分析的会贤社文人及会吟社诗人为代表。这一群旧式文人多半来自中国，也有少数是本地培养出来的。然而，不论其生长之地域背景如何，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同一模式

的传统教育，主要是从“方字小书”入手，然后是背诵儒家典籍和学习吟诗作赋。他们都颇熟习诗联及八股等文字游戏，而思想则以儒家道德为依归。虽然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下，没有机会凭科举考试进仕，但科举功名还是这些士人深切的盼望。有一些则已经在中国获得了初步的科举功名，但因种种原因未能继续在科场发展，因而南来转营别业。至于一些来自商贾之家的本地士人，因家道丰厚可以负担盘川回国应考，故尝试博取功名，以耀乡里，如第二章提到的邱菽园、黄景棠等人皆是。

要言之，这些传统士人和中国旧式的文人书生非常近似，以儒家道德为其思想形态，以诗文八股为其文字技能。而其性格亦相类，好作酬唱往来，以文会友，吟风弄月，也有些兼善书画，或好作冶游。不过，传统的中国士人，除了这一类型的书生名士之外，也有气节之士，敢诤抗论，具有极强烈的道德勇气，且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大志与理想，不同于一般优柔寡断、附庸风雅的迂儒。这一种敢作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气节之士”在早期新华社会则凤毛麟角，并不多见。由于这一类气节之士在本质上是书本知识为基础，透过理性思考与道德抱负将知识运用于社会参与及政治参与，因此和现代所谓“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intelligentsia) 之界说相近。¹ 而本书第二、三章所论皆属传统之文士与书生，所以本书不以《早期新华知识分子》为名，而泛用“士人社会”一词。其后数章所述之士，其形态则从传统的“士”逐渐转化成现代的“知识分子”。

早期新华社会中最先出现的“士”阶层，正如上述，在性格上像旧中国的文人和书生，在道德思想上倾向儒家，但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比较，又有一些显著的差别。传统中国社会的“士”，有士大夫及士民之别。士大夫为“有命之士”，与土地权力及社会统治有紧密的关系，经济上有一定的依靠；士民则

¹ 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解释，讨论的文章甚多，参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引言及李树青《论知识分子》一文，见徐复观等著《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务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初版，1982年三版），页328-340及页9-10；又参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时务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7年初版，1978年三版），特别是页53-66。

为“未命之士”，虽未服官，但多以学问为事，不耕不作，很少有自力更生者。²然而新华社会的“士”，则已经脱离了依附于土地及中国封建社会之权力基础，因此不得不自谋生计。当然这类传统文人能担当的工作或行业并不多，最普遍的是当教书先生，在有钱的商人家里“坐馆”，教导商人子弟，或在义塾及书院当教师，靠修补过活。但也有运用其识字能力及书本知识别营生计的，或做豪门的幕客，或替人书写信札，或卖文鬻画，或转学岐黄和相术等。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华文报章中，我们可以时常看到士人卖文卖画的广告，如三水邓恭叔卖字，润笔价开列如下：³

纨摺扇每握五角
五、六、七、八言对每对一元
长联十字以外 二元
大宣屏幅每条一元
中小宣屏幅 六角
中堂照屏幅两条计
册页尺内每五角，尺外至二尺每一元

也有取价更高者，如“腐道人”林筠台，太守衔，且为书法名家，善行书，列价如下：⁴

大宣四屏 四元
二宣四屏 三元
三宣四屏 二元
大宣五言大字联对 四元
二宣五言大字联对 三元
三宣五言大字联对 二元
纨扇、摺扇、册页 五角

²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台北：万年青书店，1971年），页193-199。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的起源及其蜕变，参林同济《士的蜕变》，见徐复观等著，上引书，页45-51；又参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页4。

³ 《天南新报》319号，1899年6月26日。

⁴ 《天南新报》529号，1900年3月20日。

名印 四角

堂匾招牌一尺方每字一元，大者递加

斗方、手卷、帐帷每方尺一元

除了卖字鬻画，在这些旧式文人中颇多星相之士及以医术谋生者，特别是医与儒的关系尤其密切，如1894年5月3日《星报》一篇讨论医学的文章中所说：

“上古圣人察天窥地，见微知著。审阴阳之变化，达气血之运行，因之尝药制方，著书立说。……”⁵ 在传统中国，因为读书识字者皆必读儒家典籍，而习医也必须以读书识字为进阶，故医者闲熟儒典，二者关系密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新加坡担任领事的左秉隆就是兼通岐黄之术的儒士，⁶ 而同时期的《叻报》主笔叶季允，既是儒生，也是医士，不但懂中国医道，也好研西方医学，且在1902年倡办《医学报》。⁷ 其他在“会贤社”及“会吟社”名录中的传统士人，以医术谋生甚至著名者也有好几位，如谢祝轩（同济医院及牛车水戏园后街医院）、胡翼云、徐季钧、林济星（马交街口二马路医馆主诊）等。⁸ 其他活跃于文化圈如诗社、学会中的“儒医”有：陆慎斋（在源顺街协荣茂号主诊）、郑温甫、朱呈图、李郁良、梁梦兰（在老爷宫万安和药材行）、李继桢及李文焕（吉宁街延安药店）、罗觉斯（医馆在牛车水）。此外，同时期在马六甲的陈文穗及吉隆坡的张克诚，都是传统儒士而以医为业者。⁹ 以医为业，属于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尚可保存“士”的独立人格，但其余的书生与文人，当夫子也罢，卖字画也罢，总得依赖富商为其衣食父母，便很容易成为随从力量或寄存阶级。

⁵ 《星报》1273号，1894年5月3日。

⁶ 左秉隆深懂医理，性嘉岐黄仓扁之学，并著有关医学之札记30余册，惜未梓行，现已不复存。事见于黄荫普之《记事》，载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之后，页2。

⁷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新加坡：南洋学会，1984年）第二集，页403。

⁸ 见《天南新报》419号，1899年10月24日；1179号，1902年6月18日等；又参424号，1899年10月30日之好学会学友题名录。

⁹ 《天南新报》1097号，1902年3月11日；1179号，1902年6月18日；745号，1900年11月27日及上述好学会学友题名录，另各期名录如461号，1899年12月31日；445号，1899年11月23日。至于张克诚的生平，则见第五章。

(三)

本书除了描述早期新华社会中的传统士人之性格及其生活，也显示出与传统士人有关的两种转化，一是这一类传统文士儒生朝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二是部分海峡侨生，尤其是海峡商人转变为传统士人的倾向。后者可以马六甲出生，后来移民至新加坡的仲介商人李清辉为代表，而前一类型则以天南第一诗人及推行儒学最佳的邱菽园为代表。

李清辉其人其事，见本书第四章。但第四章的重点只是写李清辉1889年到中国访问的经过，而没有对其由商转士的过程作更深入的分析。但第二章及第五章均有对海峡侨生回归中华传统的过程加以探讨，且提出李清辉的经验作为参考。李清辉由早年的“峇峇”形态发展为大商人，又因协助兴办萃英书院而最后投身于传统教育，亲自课士，而且勤习中国旧学，终于能置身士阶层，完成转化的过程。其弟李清渊，则停留于商人助学的阶段，对传统教育感兴趣，但自己并没有因而变商从士，仍保持大商贾及闽帮领袖的身分和地位。¹⁰ 其他新华社会上既商亦士、变商为士的家庭或个别人士也不少，如黄甫田、胡荫荣等皆是，显示出传统士人阶层在十九世纪末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我以为传统的士阶层在十九世纪末虽然人数增多及颇受人们尊敬，但只能算是一个“荣誉阶级”。实质上，社会上的统治权仍然操纵在掌握经济势力的大商贾手里。

邱菽园所代表的传统文人，和海峡侨生背景的李清辉走相反的方向，在十九世纪末年由传统文士的形态向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态转化。这当然不是新华社会独有的现象。像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许多传统文人因为政治、社会的剧变和西学的冲击，思想及价值观念上已经产生了变化，尤其是那些忧国忧时的士子，更有一变而为社会改革或提倡西学摇旗呐喊者。不少居住于条约口岸的传统文人，发挥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以报章及其他刊物为媒介，谈时论政，

¹⁰ 李清渊之事迹，略见本书第四章注七；又参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First ed. 1923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pt. 1985), pp. 110–111。

成为一个舆论集团，制造出传统之外的另一种“清议”。¹¹ 如上文所述，早期新华社会的传统文人，以吟风弄月、写画作诗为嗜好，而以帮助“头家”办理案牘书札以谋取生活者较多。但自九十年代以还，被时局与世变激动而集结于《星报》、《叻报》，以及后来的《天南新报》及《日新报》的一批论政书生，包括邱菽园、徐季钧、王会仪、林著筹、黄世仲、叶季允等，也好像中国的改良主义士人一般，思想上有了“进步”的表现，倡行改革和鼓励西学。但在生活和性格上，他们还是不脱旧式文人的习尚，如邱菽园，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和浅白课本等教育改革，但一方面又保留传统士人吟诗作对的嗜好，而且好作冶游，并大写其香艳诗词。其他时常在报章上发表改革议论的士人如徐季钧（钝根生）、黄世仲、林芷侔（热血冷肠人）等，皆有现代化的思想，但大都保留其旧式文人的性格和嗜好。

（四）

第五、六章都提及林文庆。林文庆在许多方面的表现，都不是传统式的中国士人，而近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发表言论，也身体力行，从理性思考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现代化的改良方案，也实际地参与社会改革。但从其他迹象看来，林文庆又有转化为传统形态的士人的倾向，他研习中国古代典籍，传导儒家思想，屡屡争取与其他传统士人同列。

最后，第七章也有另一种类型的“士”，则完全是传统之外的“文化离心分子”。他们皆属知识阶层的人，但却往往与知识阶层中的主体（norm）格格不入，原因是他们信奉异教（非中国传统的基督教）。其实这类士人在许多地方与传统儒生并无分别，甚至在传统的文字训练或熟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都颇见造诣，如黄乃裳、郑聘廷均是。而黄乃裳得到功名，德行也备受嘉许。不过

¹¹ 这类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传统文人，有王韬、汤震、陈虬等，其中以王韬最符合传统文人的典型性格，但又最能发挥现代知识分子的舆论力量。关于这群人，可参Paul A. Cohen, “The New Coastal Reformers” in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s.),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55–264 及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异于华人传统，因此一般人以另一种眼光视之。但他们对文化、国家的感情和抱负，不但不比其他传统士人来得薄弱，而且实有过之。

第七章叙述这一种变异之“士”对革命的努力，可以作为佐证。

本书所收的几篇论文，写成于不同时期，重点也不一样，并不能连贯、紧密地表达出早期新华士人社会发展及蜕变的线索，但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环绕着“知识阶层”而写，因而以“士人社会”一词以概括之，并特别撰写导论，尝试把各种士人的形态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关系简单地勾划出来，为早期新华社会，也为本书提供一条发展的线索。

第二章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 “士”阶层之分析

一、引言

研究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基本的华文史料是碑铭和报刊。碑铭对于研究早期华社不可或缺，而报刊则对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的华社历史最为重要。笔者翻阅1887年至1900年的《叻报》，发觉除了论述和消息之外，尚有许多有趣而琐碎的零星资料，如诗词联语、物价报导、广告启事等，若加以整理，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新华社会的面貌。本文所要讨论的一份名录，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希望透过对零星资料的重新整理和运用微观的分析方法，为研究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摸索出一条新路。

二、会贤社课榜名录

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所藏《叻报》缩微胶卷第一卷第1724期(1887年8月19日，星期五)开始看，很快就可以在第1725期(1887年8月20日)中见到下面这样一份名单：

会贤社六月课卷共37名：梁立新、何鸣盛、吴士达、胡鹤年、颜步青(各赏银一大元)；胡桂臣、李一川、李炳贤、霍超、彭小梁、黄图、蒋鸣谦、萧宝森、吴应谐、龚显祖(各赏银五角)。

这是一份会贤社课榜名录。会贤社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创立的一个文社，目的是培养文风和笼络士人。每月由左秉隆定出题目，称为月课。本地文人学者按题发挥，作文交卷，由领事本人或其他指定学者评定等次，分别给

赏。¹ 在1887年六月之前的课榜名录，由于《叻报》的散佚而不存，但以后的课题和得奖名单几乎每月见报，中间偶有缺漏。经过收集与整理后，得到如上面所述的名单共35则之多，兹特将每月课题及得奖名录制表如下：

《会贤社课榜名录》

年	月	课题	卷数	得奖人数	得奖人名单（由第一名起顺序排列）
光 绪 十 三 年 （ 一 八 八 七 ）	六月	人而无恒不可作 巫医论	37	15	梁立新、何鸣盛、吴士达、胡鹤年、颜步青(各赏1元)。 胡桂臣、李一川、李炳贤、霍超、彭小梁、黄图、蒋鸣谦、萧宝森、吴应谐、龚显祖(各赏5角)。
	七月	人皆可以为尧舜 说	33	15	蒋鸣谦、李一川、李天鸣、黄图、罗泉英(各赏1元)。 颜步青、何鸣盛、吴士达、梅之华、陆云峰、张乘时、霍超、何敬文、彭小梁、李凌云(各赏5角)。
	八月	政贵与民同好恶 论	30	14	卢满(赏2元)。 李一川、蒋鸣谦、吴成金(各赏1元)。 颜步青、吴士达、林思斋、卢钟灵、甘棠、曾瑞元、张图、黄图、黄捷元、邱增荣(各赏5角)。
	九月	臣事君以忠	31	15	彭晖南、黄图、吴士珍、吴士达、蒋鸣谦(各赏1元)。 章浩如、李一川、颜步青、刘尚文、杨丹书、章廷让、林绍昌、王敬承、吴子为、苏良(各赏5角)。
	十月	货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			(缺)

¹ 会贤社的规制因无1882年的《叻报》，故不得详。但据继左秉隆出任领事的黄遵宪所订立的“图南社”学规，应可推见会贤社之月课程序，因为“图南社”是继承“会贤社”的一个相同性质的文会。图南社学规如下：

- 1. 每月初一由领事署出题，初十截卷，二十发榜。
 - 2. 社中取列一二等者，照以前旧章由总领事捐廉十元以为奖赏，如佳卷增多，当另行筹加奖赏。
 - 3. 此社无论何人均能报考，各于卷面填写姓名；其列一二等者，于发榜后领卷之时，并须报名(明)住址。
 - 4. 诸生投卷之时，即领回收条一纸，以后领卷及领赏报，均以此收条为据。
 - 5. 社中课卷，现托黄墨林印刷，诸生应课者悉用此卷，以归划一。每卷定价收银二占，以为墨林堂印刷之费。
- 以上各条，见《叻报》8279号，1892年10月21日。